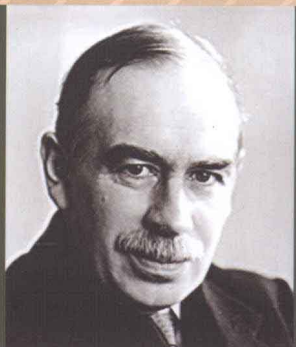


Selected Work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凯恩斯文集 下卷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

李春荣 崔人元/主持编译

John Maynard
Keyn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elected Work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凯恩斯文集 下卷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

李春荣 崔人元/主持编译

John Maynard
Keyn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恩斯文集/ (英) 凯恩斯著; 李春荣, 崔人元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7-78-7-5161-0591-7

I. ①凯… II. ①凯…②李…③崔… III. ①凯恩斯, J. M.
(1883 ~ 1946) - 文集 IV. 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769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邓晓春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63.25
插 页 6
字 数 1380 千字
定 价 168.00 元 (全三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下卷目录

经济学四大家

第一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3
第二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48
第三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77
第四章 弗朗西斯·依西德罗·埃奇沃思·····	104

劝说集

第一章 和平条约·····	117
一、巴黎（1919年）·····	117
二、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能力（1919年）·····	119
三、重建欧洲的建议（1919年）·····	123
四、观点的改变（1921年）·····	133
五、战争债务和美国·····	135
第二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45
一、通货膨胀（1919年）·····	145
二、劳合·乔治能做到吗·····	146
三、1930年的大萧条（1930年）·····	165
四、关于节俭（1931年）·····	169
五、币值崩溃给银行带来的后果·····	177
第三章 繁荣之路·····	182
一、问题的性质·····	182
二、内部的扩张·····	184
三、预算的削减·····	187
四、价格的提高·····	190

五、给世界经济协会的一个建议·····	193
六、国际通货发行和金本位制·····	195
七、结论·····	197
第四章 政治观察·····	200
一、放任政策的结束·····	200
二、我是一个自由党吗·····	212
三、自由主义和工党·····	218
四、对威尔士新作的评论·····	221
五、我们孙儿辈的经济可能性·····	224
第五章 我又跟上时代了吗·····	231
第六章 美国之行·····	239

附录 凯恩斯的投资生涯

第一章 凯恩斯，一个投资者·····	251
第二章 凯恩斯和伦敦商业区·····	270
第三章 凯恩斯与皇家学院的投资活动·····	306
第四章 琐事小记·····	320

经济学四大家

谢晓迎 梁永平 译

第一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年7月26日生于克莱法姆。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他的母亲叫丽贝卡·奥立弗^①。马歇尔家族是个西部的教士家庭，其祖上，威廉·马歇尔于18世纪末曾在康沃尔郡萨尔什塔地区做教士，阿尔弗雷德是威廉·马歇尔牧师^②的孙子。威廉·马歇尔是德文郡教区的牧师，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力神，据说他曾扭弯了马掌，这吓坏了当地的铁匠，他们竟然以为自己是在为魔鬼拉风箱。^③阿尔弗雷德的曾祖父是约翰·马歇尔牧师，他是艾克斯特语法学校的校长，他的妻子玛丽·霍特利牧师，是艾克斯特教会的副教长和天主教教团成员。玛丽·霍特利的父亲是查尔斯·霍特利牧师，她侄子是伊顿中学的校长。^④

他的父亲，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是个作风古板的人。他意志坚定，富有洞察力，严格地符合福音派信徒的脾气。他的脖子瘦骨嶙峋，尖下巴上蓄着胡子，他以自创的盎格鲁—撒克森语言写了一首叙事诗来赞扬福音教派，这首诗在这种语言的适用圈内颇受欢迎。在他92载的生涯中，他一直独断专行。这种专制的最直接受害者就是他的家庭，最早的受害者是他的妻子。但这一家庭王国的模式甚至在理论上影响到了全体妇女，这位老先生写了一本名叫《男

① 在为这篇回忆录作准备时（1924年8月），我得到了马歇尔夫人的大力支持，我必须感谢她为我提供了许多论文，以及一些马歇尔的私人笔记，我可以自由地从中引用我想要的部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自己也留下了一些自传性的手稿，我也已经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在1924年，我已经准备好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作品的书目提要表，这发表于《经济学杂志》1924年11月号上，后来又重印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回忆录》（1925年，A. C. 庇古主编）。

② 他的第三任妻子，玛丽·基特森，是他在自己的教区里施洗礼的第一个孩子，他开玩笑说她应该成为他的小妻子，结果20年之后，她果然是了。

③ 有许多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喜欢讲的，关于威廉·马歇尔惊人力气的故事。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德文郡一条很窄的小路上驾着一辆矮种马的双轮马车前进，遇到了另一辆车子，他解下马，把车子从障碍物上面举了过去。但我们可以从威廉·马歇尔晚年的一个小小装置中看出一些预示着阿尔弗雷德的将来的东西。老了以后，威廉变胖了，行动不便，由于痛风的影响，不能上下楼梯，于是他在自己常待的房间的天花板上打了个洞，通过这个洞，他可以坐在椅子上，用滑轮回到或离开他楼上的卧室。

④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与拉夫·霍特利是相隔三代的姑表亲，拉夫·霍特利是《货币与信用》一书的作者。阿尔弗雷德从细致的拉夫·霍特利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大力神牧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

人的权利和女人的义务》的小册子。遗传的力量是强大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没能避免父母的这种模式的影响，他对妇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这与他妻子的那种深情和敬意是相互冲突的；他正处于一个妇女解放和受教育的大背景之下，但他心中，同时又根植着种种控制妇女的倾向。

二

在阿尔弗雷德9岁时，他被送到泰勒商业学校读书。他的父亲看出了他的资质，就向一位银行领导请求一个名额。^①后来他曾以复杂而严肃的感情回忆起吉姆·穆勒。他经常让马歇尔和他一起在学校工作，经常为学习希伯来语工作到晚上11点，事实上，阿尔弗雷德经常被他的父亲布置了太多的工作，他经常说，是他的露易莎姨妈救了他的命，他和她在道利什附近共度了一个长长的暑假。她送给他一只船、一杆枪、一匹矮种马，到暑假结束回家时，他又黑又壮。E. C. 德莫^②，马歇尔在泰勒商业学校时的班长，回忆说，阿尔弗雷德在学校时，又矮小又苍白，衣着破旧，看上去被工作压弯了腰，人们都叫他“蜡烛”，他对体育不感兴趣，喜欢钻研象棋问题，^③不喜欢交朋友。^④

由于被提升为第三任班长，按惯例1861年马歇尔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获得了奖学金，这本来够他三年之用，或者他也可以在新大学，那时隶属于伊顿皇家或温彻斯特得到同样的待遇，这符合他父亲为他设计的教会人员之路的第一步，但这并非阿尔弗雷德的初衷——这意味着得长期处于宗教经典的奴役之下。^⑤后来，

① “你知道你是在向我要200英镑吗？”那个领导这样问，但他还是批准了。

② [德莫是关于马歇尔这一绰号的重要人物，然而他的名字被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纪念文集》的版本中删去了。在凯恩斯的文札中还保存着一封德莫写的信，信中表明德莫已记不清这个绰号了。凯恩斯是根据马歇尔留下的论文稿中马歇尔夫人所加的批注写的，她将“蜡烛”的绰号追溯到德莫，尽管德莫本人表示怀疑，但这依然可能是真的，可能是马歇尔夫人从马歇尔自己口中得出的。——原编者]以下方括弧中均同，不再一一标出。——译者

③ 马歇尔夫人写道：“从还是个孩子时，马歇尔就经常犯严重的头疼，这头疼只有靠下国际象棋才能治愈，于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父亲允许他玩国际象棋。但是后来，他让阿尔弗雷德发誓不再玩国际象棋，他终生都遵守了这个诺言，但他从报刊上看到有关国际象棋的消息时总是忍不住要兴奋。他说，他的父亲要求他严格守诺是对的，否则他会想把所有时间都用来下棋。”阿尔弗雷德有一次自己说道：“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玩国际象棋，或是沉湎于那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仅是让我们高兴的游戏。对于年轻人来说，进行一些增添生活情趣的活动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体力或是脑力活动，但是时间太紧迫，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

④ 他在学校里的主要朋友是H. D. 特雷尔——他就是后来成为牛津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及艺术家的悉尼·霍尔。特雷尔的哥哥曾给他一本穆勒的《逻辑学体系》，马歇尔和特雷尔怀着热情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在班长桌的用餐时间进行了讨论。

⑤ 在阿尔弗雷德生命将尽时，他对于自己的古典文学学习生活作了概括性描述：“上中学的时候，人们告诉我不要去注意希腊语的发音问题。我得出结论，费力地去记忆一些音调是很花时间和精力，是不上算的，因此我就不在字典里查发音问题。这使我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非常严重的惩罚，这告诉我，古典文学学习会使人不懂得时间的价值。因此我尽可能学习数学而远离古典文学的学习，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发现出色的理科学生总是很珍惜时间，而许多文科学生似乎都把时间看得很轻。我还要提一句，我的校长是一个思维开阔的人，他锻炼自己用拉丁文思索，而不是用英文思考再翻译成拉丁文。我对于他这一点的钦佩，超过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他痛苦地回忆起，他专横的父亲逼他学希伯来语到深夜，同时禁止他学习有趣的数学。他父亲憎恶数学，但阿尔弗雷德在他上学和放学时兜里藏着欧几里得的几何书，他读上一段，在一个人独行时复述，课间时独自站在一边，用脚趾勾画。泰勒商业学院六年级的课程就涉及微积分，这又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天然癖好，数学老师艾瑞说马歇尔是“数学天才”。数学代替了阿尔弗雷德的圣经，他为父亲不理解他而深感痛苦，不，他不能在牛津大学，在死的语言中埋葬自己，他要逃——逃到剑桥去。哪怕做个服务生，他也要攀登几何学的高峰，逃离宗教学的天堂。

就在这时，马歇尔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位好心的叔父，愿意借给他一些钱（因为他的父亲太穷，在他放弃牛津奖学金后，他父亲无法再给他经济上的资助），马歇尔在靠教书得到学位后，立刻还了这笔钱。其间，他每年都能从剑桥圣约翰学院^①领取40英镑帕金奖学金^②，这为他打开了数学之门和剑桥之门。而40年后，也是这位叔父给他的一笔250英镑的遗产，使他可以游学美国。阿尔弗雷德经常提到他叔父赚钱的故事，值得在这里记上一笔。他的叔父到澳大利亚去寻找机会，在淘金热中在那里安了家。出于家庭带来的小小怪癖，他情愿间接去寻找利益，于是他还保留着田园诗人的气质。但使他的邻居们觉得好笑的是，他拒绝在他的领地上雇用那些没有身体残疾的人，于是他的工地上充斥着跛子、瞎子和其他残废者。在淘金狂达到高潮时，他得到了回报，那些健全的工人都迁到了新的有黄金的地方，查利斯·马歇尔是唯一的可以坚持经营下去的人。多年后，他带着财产回到英国，准备资助一个聪明而富于反叛精神的侄子。

1917年，马歇尔将他当时和以后的工作方法记录了下来：

我想大约是在17岁时，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我站在摄政街上，看到一个工人闲立在一个商店的橱窗前，但他的面部却显得机警而有力。于是我停下来观察。他打算在商店的橱窗玻璃上写一些有关该商店经营范围的简介，这些字将用白色的字写在橱窗上，这需要他的手和胳膊的每一笔都必须非常简洁，才能达到好的效果。这大约需要两秒钟的极端集中精力，所以，他在写完每一笔之后都要静立几分钟休息，使他的心跳恢复平静。如果他为了节省那几分钟的休息时间而一气呵成的话，他的老板的损失可能比他一天的工钱都多。这件事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我决心每当我的大脑处于不兴奋不清醒的状态时我就不再强行使用它，并且把连续运动之中

^① 这儿有一封圣约翰学院院长贝特森博士致泰勒商学院院长赫西博士的信，信写于1861年6月15日，信中说了这个奖学金，并且这封信是贝特森博士对马歇尔很感兴趣的早期证明——正像奥特博士后来也对他感兴趣一样。当1877年，马歇尔博士申请布里斯托尔学院的职务时，贝特森博士写道：“我非常欣赏他的那些特殊的品质，极端简单的、热情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的品质。”

^② 同年他又获得了另一笔奖学金。

的间歇看成一种为达到绝对宁静而作出的牺牲。当我来到剑桥，可以完全为自己做主时，我决心不再连续不休息地攻读数学一刻钟以上。我随身带一些轻松的文学书籍。在休息时，我曾不止一次地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这是唯一一部我可以不费力地阅读的希腊剧），以及卢克莱修的大部分作品，等等。当然，我常常读数学读得兴奋，一口气读上半小时或更多，但这时我的大脑是集中的，这仍然无害。

具有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的能力，以及缺乏在长时间内连续集中精力的能力，这是马歇尔一生中的特点。他很难集中精力一下子完成一项大的工作，他也常为缺乏持久的记忆力而苦恼。在大学期间，他的数学作业总是令他苦恼不已，他在孩童时代的显而易见的数学天赋，后来终于失掉了。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实现了他的壮志。1865年，他是剑桥数学学位第一批及格者中的第二名，^①那一年的第一名是洛德·瑞利。马歇尔很快就获得了研究员的职位。他打算献身于分子物理的研究，同时在珀西瓦尔（他对此人充满了崇敬之情）领导下的克利夫顿学校担任数学教师，以此谋生（并偿还他欠查利斯叔父的钱）。不久，他回到剑桥，为参加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学生作短期的教练，“以这种‘数学’的途径”，他说，“我付清了我的欠款，这样，我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了”。

马歇尔在克利夫顿期间的主要收获，是他与 H. G. 戴金斯的相识。戴金斯是 1862 年来做克利夫顿大学院院长助理，协助组建该校的，也是通过他，马歇尔认识了 J. R. 莫兹利。友谊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阶层的门，这阶层的中心人物是亨利·西齐威克。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马歇尔与当时的知名人士有过交往，但他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就成了一个叫“格罗特俱乐部”的小型非正式的言论社团的成员。

格罗特俱乐部的运行方式是，在可敬的约翰·格罗特牧师特朗平顿的住所吃过晚餐后，进行讨论。格罗特是奈特布里奇的伦理学教授，从 1855 年开始任职直到 1866 年去世。最初的成员，除了格罗特以外，还有亨利·西齐威克、奥尔迪斯·赖特、J. B. 梅厄和约翰·维恩。^②不久以后，皇家学院的 J. R. 莫兹利和圣约翰学院的 J. B. 皮尔逊也加入了俱乐部。马歇尔是这样记叙他与这一社团的交往的：

我 1867 年参加时，活跃分子是 F. D. 莫里斯教授（格罗特的前任）、

^① 在第一批及格者第二名的行列中，有一些著名人物，其中包括休厄尔、克拉克·马克斯韦尔、凯尔文和 W. K. 克利福德。

^② 维恩博士对早期会议的记述，请见《亨利·西齐威克自传》，第 134 页。

西齐威克、维恩、J. R. 莫兹利和 J. B. 皮尔逊……到 1867 年或 1868 年以后，俱乐部开始有些衰落，但是 W. K. 克利福德和 J. F. 莫尔顿的加入给俱乐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西齐威克、莫兹利、克利福德、莫尔顿和我是积极分子。我们都经常参加，克利福德和莫尔顿那时读的关于哲学方面的书还不多，因此他们在讨论开始的半小时中很少说话，热衷于倾听别人的谈话，特别是西齐威克的话。不久，他们就开始开口了，并且进步神速。如果让我原原本本地将他们哪一次讨论复述出来，我将从西齐威克和克利福德主讲的那些晚上选出两三篇来。另一种场合可能是在格罗特俱乐部的会议开始前的喝茶时间进行的谈话，只可惜我没有将这些及时记录（我想大约是在 1868 年）。在这些谈话中，经常只有莫里斯和西齐威克说话。西齐威克努力要莫里斯回忆 30、40 乃至 50 年代时在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涯，莫里斯说得神采奕奕，在回答西齐威克的要求和建议时，他有一种特殊的圣洁的光辉。结束时，我们其他所有人都纷纷感激莫里斯给了我们那样愉快的夜晚……^①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影响之下，马歇尔在精神发展历程上出现了一次危机，这一点，他后来常常提到。他的物理学习计划（用他自己的话说）“由于对知识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神学突然产生的浓厚兴趣而大打折扣”。

马歇尔在剑桥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攻读传统数学并不与他早年度诚的宗教信仰相矛盾，他依然希望被授予神职，有时还热情地祈望能到国外传教。他终身都是传教士，但在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的宗教信仰败下阵来。在余生里，他成了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对那时他与西齐威克的关系，马歇尔如是说（1900 年 11 月 26 日在三一分会纪念西齐威克的集会上）：

尽管我不是他名义上的学生，但在伦理学领域，我确实是他的学生，而且是住校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说，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当我感到困惑时，我向他寻求援助；当我身陷困境时，我向他寻求安慰。我也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失望而归，我在他身边度过的是不寻常的时光，他让我重获生机。我所克服的困难和面对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曾克服过，而他有着更渊博的知识和更强大的力量。也许在所有那些要向他致以谢意的人当中，我是最感激他的。

马歇尔在剑桥任教的时期，我想这应该是历史学家们认定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这是基督教义脱离了严肃的英国哲学世界的严峻时刻，至少是脱离了剑桥的哲学世界。1863 年，24 岁的亨利·西齐威克曾为得到研究员资格而同

^① 参见《亨利·西齐威克自传》，第 137 页。

意遵守“三十九条”^①，并曾全力去阅读希伯来文的《申命记》以及准备讲授《使徒行传》。穆勒是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在1865年出版《汉密尔顿哲学探讨》之前^②，从来没有写过与宗教信仰有任何分歧的文章。在此前后，莱斯利·斯蒂芬是英格兰国教会的牧师，詹姆斯·沃德是非教徒的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个牧师职位的候选人，W. R. 克利福德是个高级教士。1869年，西齐威克辞去了他的神职研究员的职务，“以便从教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久以后，这些人就都不再是基督徒了。但是马歇尔和西齐威克一样^③，尽可能不采取“反宗教”的态度。他对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基督教的理想以及基督教的动机都持认同态度，他的文章从未以任何形式贬低过宗教信仰，也极少有学生能清楚地讲出他的宗教观点。在生命将尽时，他说“宗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就是说，他虽然放弃了神学，但却越来越笃信宗教。

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巨大变化是一种理智上的转变，而非后来时代发生的那种伦理上的或是感情上的转变，这种转变完全是因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而产生的。马歇尔常把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归结于围绕着H. L. 曼塞尔所著《班普顿演讲集》而展开的争论。马歇尔最初看到这本书，是在J. R. 莫兹利那里。虽然在今天看来，曼塞尔算不了什么，但在19世纪60年代，他是试图寻找基督教义的理性基础的最后一次尝试的倡导者，因此显赫一时。曼塞尔曾任牛津大学的教师，后来成为圣保罗学院院长。1858年，曼塞尔“采纳了汉密尔顿^④的独特理论，把康德引入英国国教事业中来”^⑤——这是人类思想上的奇怪逆转，它在牛津的影响超过了50年。1858年，曼塞尔所著《班普顿演讲集》一书的出版使他成为保守派知识分子的领袖。1865年，当马歇尔获得了学位，开始关注宇宙奥秘的时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汉密尔顿哲学探讨》。这本书批判曼塞尔将汉密尔顿的理论延用到基督教神学之中，曼塞尔对此作出了回击。曼塞尔对保守主义的辩护“向我表明”，马歇尔说，“保守派中需要辩护的地方何其多”。这场大争论使得马歇尔渐渐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并驱使他进行一些形而上学的研究，进而研究社会科学。

就在《班普顿演讲集》出版的第二年1859年，《物种起源》问世了，这本书将人们的思想从天堂的迷云间带回来陆地，开辟了光明大道。在1860—

① 他在1861年决定不接受神职任命。

② 穆勒的《论宗教》中反映了他的终极观点，这本书直到他去世之后的1874年才得以出版。

③ 关于西齐威克后半生生活态度的最有趣的概括，见于他的《自传》第505页。W. K. 克利福德《宗教伦理学》（《讲座与短文》卷2，第244页）的最后一段反映了马歇尔另一个富于个性的反应。

④ 1836年，威廉·汉密尔顿先生在证明了他的家世并获得准男爵的勋位之后，又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在接下来的8年中，他开了著名的讲座，进行了一番危险的尝试，把从康德和德国哲学家那里得到的东西，作为一种附加的影响增加到了苏格兰的传统常识之中。

⑤ 斯蒂芬：《英国的功利主义者》卷三，第382页。

1862年间，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原理》（现在还是很难读懂），也是起源于汉密尔顿—曼塞尔的争论。这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以不可知论研究形而上学，并告诫那些未形成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观念的人不要走进死胡同。^①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进化论以及——上一代人那里留存下来的——功利，一起把青年一代的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因此，马歇尔的注意力从形而上学转向了伦理学。我认为，马歇尔从未明确背离过主宰着他的经济学先辈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令人注意的是，他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十分严谨的——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西齐威克，而与杰文斯立场相反。也就是说，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没有某一项经济学研究是和伦理学的教义特别地联系起来的。在马歇尔看来，解决经济问题并不是享受主义者的算计，而是人类发挥更高才能的先决条件，这种“更高”的才能究竟指的是什么并不重要。经济学家可以向人们宣告：“对贫困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对相当一部分人堕落原因的研究。”^②这一宣告已充分说明经济学家的目标。相应地，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家领域的事实及其推论，而这正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这在讨论“有关道德和人类本质上的政治能力问题，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信息，他得像其他人一样行动，并且作出他可能作出的最好的猜测”^③。这就是他找到的最后的位置。不管怎么说，他是从伦理学研究着手研究经济学的，在他走到生命尽头对自己的思想历程进行回顾时，他说：

我从形而上学进入伦理学研究。但对于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论证并不容易。一个朋友读过许多所谓“道德学”学科的书，他总是说：“啊，如果你真的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我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我对机会不均等的合理性起的怀疑，甚于我对物质享受不平等状况的怀疑。于是，在那个暑假里，我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穷的居住区，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访那些最贫困的人。接着，我决定尽我所能地开始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④

^① [编者注。有关这一点，《纪念文集》版本中加上了以下的三个句子：“大约在同时，《论文与评论》的出版和科林索主教被驱逐出教会，这两件事标志着教堂内部的势力也在分裂。在查利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出版不到20年里，经久不衰的信念崩溃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观念焕然一新，后代和前辈人之间出现了鸿沟，而就在此之前，甚至连严肃的哲学家还都逐字逐句地接受《创世记》的第一章……”这段附加的话，是从J. R. 莫兹利的一封信中摘出的，这是他在读了《经济学杂志》版本之后写下的信，这封信目前保存在凯恩斯的文札中。]

^② 见《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第3页和第4页。

^③ 同上。

^④ 这是马歇尔夫人从废纸篓中抢救出来的。马歇尔的大部分脑力劳动成果都被他自己丢弃在废纸篓里，这一点倒很像他的曾叔父李查德·马歇尔牧师。据说李查德是个很出色的诗人，但总是不愿发表作品，且极为反对在他死后发表自己的作品，他把所有文章都烧了。

关于马歇尔进入经济学界的过程，在1917年为《货币、信用和商业》所写序言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大约在1867年（那时我主要是在剑桥教数学），曼塞尔的《班普顿演讲集》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人自身的各种可能性才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我花了些时间来研究形而上学，但不久之后我又开始从事较为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上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能力的可能性。这使我进而想到了下面的问题：英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通常离满足其生活需要的水平还差多远？睿智的老人告诉我，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使他们有学习的闲暇和机会；他们还告诉我，我应该学习政治经济学。我遵从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看成一个在干巴巴的事实的土地上流浪的人。我也渴望尽早回到那种纯思想的闲暇之中，但我对经济学研究得越多，我越发现自己知之甚少。现在，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紧张的学习和研究，我比开始学习时更加感到自己的无知。

1868年，当马歇尔还处于形而上学研究的阶段时，一种想读读康德原著的愿望使他来到了德国。“康德是我的导师”，有一次他说，“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除了他晦涩难懂之外，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难道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是可以被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只属于少数人的吗？”他与一位早先曾教过亨利·西齐威克的德国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顿。^①他开始接触德国的经济学家们特别是罗雷尔的著作。最后，圣约翰大学的校长贝特森博士帮助他说服了学校，为他设了一个伦理科学的讲师职位，^②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由此开始。但在一段时间内，他还讲授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的短期课程——逻辑学和边沁的功利主义^③。

马歇尔为经济学研究献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是这样想的，与按照父亲的愿望行事相比，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为期两年的反复考虑和犹豫不决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的日子里，他经常提醒那些他认为值得大加指导却怀着一种对科学漠不关心的态度进行研究的学生——他认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拥有幸福生活的机会和人们的快乐。

① 1870年的冬天，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又来到了德国，住在柏林。

② 在马歇尔去世前几个星期，我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他特别关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贝特森博士的友善行为，以此来为自己的一生作结论。剑桥的第一位“伦理学教授”J. B. 梅厄这时在圣约翰大学开设同样的课程已有一段时间，而圣约翰大学的J. B. 皮尔逊教士也是一位伦理学专家，在同一门课程上再聘请另一名教授是一件很反常的事。亨利·西齐威克早在1867年被聘为三一学院的伦理学教授，维恩于1862年作为伦理学教授回到剑桥。

③ 马歇尔夫人回忆，19世纪70年代在纽纳姆学院时，玛丽·肯尼迪（R. T. 赖特夫人）和她不得不为他写“边沁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对话”。

在结束马歇尔尚未成为经济学家的那段日子之前，我们应该稍停一下，看看他那时对于人生的看法的基调，这种基调在他心里根深蒂固。

与他的两位同事——亨利·西齐威克和詹姆斯·沃德一样，马歇尔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担任剑桥大学伦理学教授，并属于贤人兼牧师的一类人；也像他的那两位同事一样，马歇尔还是个科学家，具有双重本质。作为一个牧师和教士，他不比同类人更高明，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却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位。但是，他自己更愿意在前一方面出类拔萃，这一方面应该是主；第二方面，只是仆而已。第二方面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断探索知识，第一方面只好从抽象的目标降低到实际进步的需要，鹰的锐利的眼睛和扇动的翅膀，经常被召回地面，去做一个伦理学家要做的事。

这种双重本质，正是马歇尔的弱点和能力的混杂性的原因，也是他的目标自相冲突和精力浪费的原因，是他的观点总是存在矛盾，总是又同情又厌恶的原因。

他性格的分裂性，从另一方面来看又完全是一种优势。经济学研究似乎不需要那种出类拔萃的更高的天赋。理智地说，与哲学和其他纯科学中更高深的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学科吗？但是，能称得上好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是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却没有几人精通！这种现象看似自相矛盾，却也能找到一个解释：也许是因为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一种特有的综合素质，他必须在好几个方面达到一个高的水准，必须综合一些通常人们不会同时具备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同时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必须理解符号，却用语言表达自己；他必须在一般现象中考虑特殊性，在玄想中抓住本质和抽象的东西；他必须以史为鉴，研究当前，面向未来。没有什么人类的本性或制度可以完全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外，他必须是目标专注的，同时却并不情绪化，他像艺术家一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贴近现实。在这理想化的多方面素质中，马歇尔具备许多，但不是全部，从主要方向来看，他所接受的综合训练和他的分裂的性格，使他具备了一个经济学家必备天赋中最基本和最本质的东西——他显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

三

要详述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发展比较困难，这是因为任何一部著作从最初生发动机，经由向学生口头讲授，再到印刷成册最终面世，中间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作这种尝试之前，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马歇尔从1868年被聘为剑桥圣约翰学院讲师，到1885年在剑桥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这一

段历程。^①

马歇尔在圣约翰学院做了9年的研究员和讲师，为他的研究课题打下了基础，但没有什么成果发表。^②他加入格罗特俱乐部后，与W. K. 克利福德^③和弗莱彻·莫尔顿十分亲密。克利福德是最受欢迎的伙伴，尽管他“总爱做些惊人之举”。不久以后，马歇尔成为“埃拉纳斯”的成员，他开始与西齐威克、维恩、福西特、亨利·杰克逊以及剑桥开放初期的其他领导者建立了联系。在这一段时间，他几乎在每个长假里都要出国，马歇尔夫人这样写道：

他带着60英镑^④和背包，大部分时间都在阿尔卑斯的高山之间漫游。数个夏天的这种旅行，使得他的身体由虚弱而变得强壮。他在6月初带着疲惫的身躯离开剑桥，等到10月回来时，他已变得又黑又壮，昂首挺胸。背着包使他习惯于挺立，直到80多岁时他依然如此。有时他不惜强忍身体的疼痛来保持挺直。在阿尔卑斯山漫游时，他的作息是：早上6点钟起床整理行装，8点之前动身起程，背着包走上两三个小时，然后找地方坐下来，有时坐在冰川上，看上好一会儿书——歌德或黑格尔或康德或赫伯特·斯宾塞——之后继续赶路，一直走到晚上歇脚的地方。这是他的研究哲学的阶段。后来，他在漫步时开始思考国内和国外贸易理论。他经常把一大箱子书从一站预送到下一站，而自己通常只背着个背包走上一周或更长的时间。他常在湍急的小溪中洗衬衫，然后把它挂在肩头的铁头登山杖上晾干。在这阿尔卑斯的孤旅中，他完成了他大部分最艰难的思索。

这种漫游的经历使他对阿尔卑斯山总怀着一种眷恋之情，甚至到1920年（最后一次）我们来到了南蒂罗尔山，在这里，他于白云深处继续工作休息。

阿尔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时总是精神抖擞。当他在圣约翰大学做研究员时，他总习惯于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以及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进行他主要的思考工作。白天，他独处于旷野中，晚上，他又独居于修道院的新庭院里。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时候，他在一家安静的旅馆房顶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板当做凉棚。在牛津时，他在花园里做了一个“书斋”，在里

① [《经济学杂志》和《传记文集》中写作“1885”，《纪念文集》中写作“1884”年，见161页上的编者注。]

② 这一时期中偶尔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收录在1924年12月《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著作目录中。

③ 克利福德比马歇尔年轻3岁，他1863年进入三一学院，1868年被选为研究员。他住在剑桥，他的房间是“一大帮学友们的聚点”，一直到1871年（参见后面波洛克爵士的回忆录）。

④ 他曾经承认过，他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每年的花销是300英镑，其中还包括用于假期旅行的60英镑。